

孫子兵法注譯

21

重刊  
良民  
北師社

# 孙子兵法注译

中国人民解放军 0425 部队理论组

云南大学历史系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75年昆明

## 孙子兵法注释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刷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1092<sup>1</sup>/<sub>32</sub> 印张：3<sup>7</sup>/<sub>8</sub>

1975年12月第一版 1975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5,800

统一书号：11116·27 定价：二角四分

## 目 录

孙武小传 .....	( 1 )
计 篇 .....	( 12 )
读《计 篇》 .....	( 17 )
作战篇 .....	( 19 )
读《作战篇》 .....	( 24 )
谋攻篇 .....	( 27 )
读《谋攻篇》 .....	( 32 )
形 篇 .....	( 35 )
读《形 篇》 .....	( 40 )
势 篇 .....	( 42 )
读《势 篇》 .....	( 47 )
虚实篇 .....	( 49 )
读《虚实篇》 .....	( 56 )

军争篇	.....	(59)
读《军争篇》	.....	(65)
九变篇	.....	(68)
读《九变篇》	.....	(72)
行军篇	.....	(75)
读《行军篇》	.....	(83)
地形篇	.....	(86)
读《地形篇》	.....	(92)
九地篇	.....	(94)
读《九地篇》	.....	(104)
火攻篇	.....	(107)
读《火攻篇》	.....	(111)
用间篇	.....	(113)
读《用间篇》	.....	(118)
后    记	.....	(120)

# 孙武小传

关于孙武其人和《孙子兵法》，自《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明确记述以来，直到宋以前的千年间都没有人怀疑过孙武其人和他的著作权。南宋叶适对这个问题提出异说以后，于是众说纷纭：有的说《孙子兵法》不是孙武所作，有的说孙武就是孙臆，甚至提出历史上究竟有无孙武其人的疑问。解放以来，虽有调和众说的意见，认为《孙子兵法》导源于孙武，完成于孙臆，但也没有解决这千年来的大悬案。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促进了考古工作的进行。考古工作者于一九七二年四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的一座汉墓中，发掘出大批文物。不仅挖掘出了《孙子兵法》，还发现了失传一千多年的《孙臆兵法》。银雀山的考古发现，以珍贵的史料有力地证明：孙武正是《孙子兵法》的作者。而孙武和孙臆则是分别生活于春秋末和战国中期的两个人。他们都著有兵法流传于世。更宝贵的，在《孙子》十三篇外，还出土一些不见于史籍的谈论政治的重要佚文。银雀山汉墓出土，既以铁的证据解决了千年来的大悬案，而且直接提供了研究孙武思想的第一手材料。这对于我们总结和研究先秦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一)

孙武，字长卿，春秋末期齐国乐安（今山东惠民）人。其

生卒年月不可考，约和孔丘同时代。他的祖先是因陈国内乱逃奔齐国的陈公子田完。齐景公时，田完的五世孙田书，以伐莒有功，赐姓孙，并封乐安作为采邑。田书的后世孙孙武，又因齐国内乱投奔吴国，得到吴王阖闾的重用。

孙武生活的春秋末期，正是我国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大变革时代。当时，由于铁器大量使用于农业，使生产力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需要而成为桎梏。奴隶们为了反抗这种束缚，暴发了连绵不断的起义，严重地冲击了奴隶制，封建的生产关系也从中萌芽、发展起来。鲁国“初税亩”的推行，把奴隶制枷锁砸出个缺口；季氏“尽征之”、“用田赋”的变革，开了封建制赋税的先河。随着这一系列的变革斗争，法家思想出现了。晋国“铸刑鼎”，邓析著“竹刑”，初步限制了奴隶主阶级的特权，更加速了奴隶制的没落、衰败，封建制的兴盛、发展。与此相反，一些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奴隶制，力竭声嘶的制造反革命舆论，也就形成所谓的儒家思想。法家要革命，儒家反革命，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极为尖锐。两个阶级之间的政治斗争，必然导致两个阶级之间的战争。

随着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农业奴隶和工商业奴隶为了砸碎脖子上的锁链，不断发起暴动，反抗奴隶主的剥削和压榨。著名的如陈国筑城奴隶的暴动，杀了奴隶主贵族庆寅，庆虎；卫国的手工业奴隶，先后两次暴动，围攻卫庄公。尤其是柳下跖率领的奴隶起义，“横行天下，侵暴诸侯”，势如燎原烈火，迫使大小国家的奴隶主贵族躲藏在城堡里，异常沉重地打击了奴隶主阶级，为新兴地主阶级的革新扫清了道路。春秋时期，就在大大小小的数十次奴隶起义的推动下，许多国家的新兴地

主阶级都乘势进行社会变革，发展武装力量，与奴隶主贵族展开了激烈的夺权斗争。“‘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横行天下”的奴隶起义、新兴地主阶级武装夺权的斗争，汇成了滚滚的战争洪流。在这个天翻地复的大变革时代，革命战争成了封建制诞生的助产婆。春秋末期，新兴地主阶级基于同奴隶主阶级的夺权斗争，迫切需要系统的军事思想来指导战争。孙武看到“天下大乱”的特点，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适应新兴地主阶级的需要，总结了新兴地主阶级所进行的革命战争的经验，又以亲自实践的感受加以丰富、发展，著为《孙子》十三篇，建立了一整套军事理论，为当时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提供了有力的武器。

## (二)

春秋时期，吴国是一个弱小的国家。它的南边是越国，西边是强大的楚国，北边是齐、晋，常常受到威胁。公元前五十四年闾阖做吴王，他看到了法家思想的进步性，任用伍子胥为相，基本上推行了一条富国强兵、任人唯贤的法家路线。孙武到了吴国，经过伍子胥的推荐，并将所著十三篇兵法献给吴王，吴王读后很高兴，任用孙武为将军。

孙武眼见没落的奴隶主贵族，正采用残酷镇压的手段进行垂死挣扎，乃提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看法。针对孔老二表扬“三战皆北”的人为“孝子”的谬论，坚决主张“以法治军”。为了强兵、国富，他指出战争与政治经济的密切关系。为了争取人民，他强调政治和经济革新。这些主张，通过孙武在吴国的实践，证明是切实可行的。由于革命战争是推行法治的关键，



这里从“以法治军”说起。

孙武第一次见到吴王阖闾时，吴王为了考察孙武的军事才干，故意挑选了一百八十名宫女交给孙武操练，吴王亲自坐在高台上观看。孙武把宫女分为左右两队后，由吴王的两个宠姬分任队长。孙武向宫女们一一交待了操练的方法，并着重指出“令出法随，决不能违背”。约束既定，孙武便发出鼓号指挥操练。宫女们却嘻嘻哈哈笑作一团，不按军令操练。孙武再次反复说明（“三令五申”），宫女们还是嘻嘻哈哈，仍不按军令操练。于是，他板起面孔对执掌军法的人说：军令和操练方法我都交待清楚了，大家不照办，那就是队长的责任了，左右队长应受军法处分。喝令把左右队长拉出去问斩。吴王在高台上看见，急忙派人赶来说情，声称离开这两个爱姬，饭都吃不下，要求孙武不要杀她们。孙武回答说：我既受命为将，一切就得按照军令办事，如果君王的旨意与军规相违背，我是不能听从的。孙武坚决按照军法处决吴王的两个爱姬后，又挑选了两个做队长，重新开始操练。这时，宫女们不敢嘻笑了，都小心谨慎地按照军令操练，前后左右丝毫不乱。吴王看到了孙武一丝不苟的严格训练，深信孙武不但善于著书总结经验，而且有指挥作战的实际本领，担当得起吴国将军的重任。在孔老二鼓吹“刑不上大夫”的嚎叫声中，孙武竟敢在吴王面前斩杀违反军令的宠姬，无视奴隶主阶级贵贱亲疏的等级制度，充分显示了孙武的法治精神。“吴宫斩美姬”成了孙武推行“以法治军”的佳话。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份。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孙武重视军队建设，推行“以法治军”的路线，这与他的政治立场是分不开的。他支持

新兴地主阶级的变革，主张通过战争打碎奴隶制的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兴地主阶级的国家政权。在新兴地主阶级向奴隶主阶级夺权的斗争中，他看到军队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要保证新兴地主阶级夺权斗争的胜利，就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并用进步的军事思想进行指导，才能赢得革命斗争的胜利。因此，他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就是说，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关系着人民的生死，国家的存亡，不能不认真研究。

由于孙武把战争看作是关系到国家存亡，人民生死的大事，因此，他非常重视军事与政治经济的关系。他总结新兴地主阶级夺权斗争实践的经验，认识到，只有实行政治和经济革新，才能得到人民的归心。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吴问》中，孙武分析说晋国范氏、中行氏、智氏必将灭亡，也是运用这一经验的结果。这个分析也证明了孙武的政治远见。吴王问孙武说：“六将军（即六卿。指范氏、中行氏、智氏、韩、赵、魏）分守晋国，谁先灭亡，谁能强胜起来？”孙武说：“范氏、中行氏先灭亡。”吴王又问：“此后又是谁先灭亡呢？”孙武说：“智氏先灭亡……”。吴王又说：“你能把这样论断的根据讲给我听听吗？”孙武回答：“可以。范氏、中行氏的田亩小，赋税高，于是民穷而公卿富。国家养着很多的军队和官吏，国军骄傲，臣下奢侈，靠穷兵黩武来发展势力，必然加深人民的痛苦，得不到人民的拥护，因此范氏，中行氏先灭亡；智氏的田亩制度，统治者的骄奢淫逸，与范氏，中行氏差不多，所以在范氏、中行氏灭亡后，定是智氏灭亡。”孙武的这番对话，与其后几十年的历史发展情况完全符合，证明孙武的预见是准确的。由于孙武在当时有比较正确的立场和观点，他就能比较全面地看到军事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他提出的“道、天、地、将、法”

互相联系的观点中，就把以政治条件为内容的“道”放在首位。

革命导师恩格斯指出：“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经济的条件和资源帮助‘暴力’取得胜利，没有它们，暴力就不成其为暴力。”孙武也很重视战争对经济的依赖关系，他根据军事上度、量、数、称、胜这五个相互对立而又可以转化的范畴指出：由于敌我双方土地大小（度），物产多少（量），人口众寡（数）等，就形成双方力量优劣的对比（称），构成了战争胜败的物质基础。“每天开支千金，十万大军才能出动”，若无雄厚的物质基础，战争就很难取得胜利。他也看到战争对经济的破坏作用，指出“既要了解用兵之利”，也要知道“用兵之害”。他从保存自己的经济、军事实力出发，竭力反对迟缓的消耗战和消极的防御战，认为他将导致民穷财尽而破坏国家的经济，从而主张速决的运动战。孙武的这些观点，是与春秋末期的社会经济状况相联系的，在战役和战斗上也是正确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说：“在战役和战斗上面争取速决，古今中外都是相同的”。但在反革命势力暂时强大，革命势力暂时弱小的情况下，就决定了战争的持久性，就要“反对战役的持久战和战略的速决战，承认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孙武生活在两千多年前，军事思想固有其时代的特点，但他对彻底推翻奴隶制政权、建立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需要一个长期的斗争过程，是认识不足的；因而对速战和久战的辩证关系，也就不能予以正确地阐明。

孙武总结了许多战争的经验，认为根据客观存在正确判断情况，掌握了作战的主动权，战争的胜败，力量的强弱是可以改变的。他把这些经验运用在他的战争实践中，打了不少胜仗。公元前五一二年，吴王准备大举进攻楚国，但从当时的情

况来看，“楚之为兵，天下强敌也”，吴国和楚国相比，不论领土面积，人口兵力，物质财富都很悬殊。孙武并没有因为楚国的强大而表现出怯弱。他全面的分析了决定战争胜负的客观因素，制定“以寡击众”的战略战术原则，认为整体上楚虽居优势，但在局部上却可集中兵力“以十击一”。他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机动地指导战争，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把吴国的军队分为三军，轮番袭击，疲惫、消耗、调动了楚军，使楚军在战争中损失了大量的有生力量。吴国因“民劳”，不能继续用兵，乃还军休整。五年以后（公元前五〇六年），吴国养精蓄锐，乘楚国君臣不谋，联合了唐、蔡两国的军队，进攻楚国，一举攻下楚国都城郢（今湖北江陵）。在破楚关键性的一战——柏举之战中，就是利用楚军分兵断吴兵后路的时机，集中自己的优势兵力与楚国进行决战而取得战争的胜利。吴国于是“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武这些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及转弱为强的辩证观点，与孔孟的“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的形而上学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孙武能够根据前人和当时作战的经验，制定出一条正确的军事路线，提出许多至今还放射着光彩的名言，最主要的是因为他的军事思想是建筑在朴素的唯物主义和原始的辩证法的基础上的。

孙武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首先表现在反对儒家唯心主义的天命观。他嘲笑儒家的那些奴隶主贵族在出兵打仗前要祷告上帝，占卜打卦，把战争胜负看作是上帝、神鬼决定的。孙武尖锐地指出：“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否定天是有意志的，是主宰一切的神的反动观念，而把天看作是一种客观的自然现象；否定了反动的天命观，认为战争的胜负决定于人，决定于客观的物质条件和敌我双方的情况；强调“不可取于鬼

神”而“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就是说，打仗不能靠神灵保佑，而是取决于人对敌情的了解，取决于天时、地利等各种因素的正确利用。孙武重视人在战争中的作用，考虑战争的部署不是凭自己的主观想象，而是根据天时、地利、将帅、士兵等等客观物质条件。

在指导战争时，孙武认为不可简单地模仿类似的情况去行事，不能用机械的固定不变的标准去衡量，强调“因敌变化而取胜”，对不同的敌人，要用不同的方法对待。如对贪利的敌人，要用“利”去引诱他；对骄傲的敌人，要用卑词示弱使他麻痹松懈；对强大的敌人要暂时避免同他作战；对于休整饱食的敌人，要使他疲劳饥饿。用不同的作战方法处理战争中不同的战况，创造条件促成事物向有利于自己方面的转化。在两千年以前，孙武就能用这种辩证观点来指导战争，是很难能可贵的。

### (三)

孙武一生的活动事迹留传下来的虽不多，但保存下来的事迹，体现了他理论与实践的一致，反映了法家富国强兵的法治精神。他重视战争与政治、经济条件的密切关系，《计篇》中的“五事、七计”，《形篇》中的“修道而保法”以及“度、量、数、称、胜”等名言，导致形成战国时期法家的农战政策，至今还放射着灿烂的光辉。《孙子》十三篇的其他各篇内容也很丰富，充满了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思想。如《虚实篇》指出的“胜可为也”，目的在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计篇》指出的“攻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强调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谋攻篇》指出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重视对战争胜败的客观条件的分析研究，反映了战争发展的一般规

律。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光辉著作里说：“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又在《论持久战》一文里说：“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

“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孙武的军事思想，也是他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立场与儒家反动军事思想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儒家的创始人孔丘，为了“克己复礼”的反革命活动，十分强调反革命武力，声称“有文事必有武备”，但他所重视的是反革命武力，只准腐朽没落的奴隶主阶级掌握。鼓吹“礼乐征伐”必须“自天子出”，胡说“政逮于大夫”，“陪臣执国命”的好景不长；诬蔑所有政治革新和革命行动为“犯上作乱”。为了加强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表——鲁君的统治，他就阴谋用武力堕毁新兴地主阶级代表季孙、叔孙和孟孙三家的城邑，镇压新兴势力。为了复辟奴隶制，他掌握大权不久就杀害法家先驱少正卯。为了防止新兴地主阶级的夺权斗争，在陈恒杀了齐简公时，他哀求鲁君出兵讨伐陈氏。所谓“去兵、去食”或“军旅之事，未之学也”云云，和他满口讲的仁义道德一样，完全是别有用心地欺骗人民的谎言。孔老二这一条反动的军事路线，说明当时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是如何的尖锐、严酷！

孙武看到奴隶主阶级及其代言人孔丘那样鼓吹征伐，疯狂镇压奴隶起义，妄图阻挠社会前进的倒行逆施；也看到广大奴隶如火如荼的起义斗争，尤其是在起义英雄柳下跖的武器批判和

思想批判的启示下，才深有所感地提出“兵者，国之大事”的主张，并针对孔老二“去兵，去食”，“有礼无败”等谰言，强调“修道而保法”，主张政治进步，“以法治军”。若“将弱不严，教导不明”，即不严格实行法治，就不能取得必胜的效果。因此，《孙子兵法》既是激烈的路线斗争的产物，也贯穿着对儒家反动军事思想的批判，引起了历代反动儒生的惊恐和仇视。《论语》、《春秋》、《左传》采取消灭事迹的拙劣手法，同不记载法家先驱少正卯的事迹一样，也从不提孙武一语。宋代以后，一些腐儒，假借“考据”为名，肆意歪曲《孙子兵法》；北宋时苏洵攻击孙武用兵打仗不能取胜，与兵书上所说的相差很远，孙武在战斗中很少立功；南宋的高似孙更恶毒地说：用兵的流毒就是从孙武开始的。攻击孙武兵法中舍弃了“正道”，违背了儒家“义”的原则。更有些反动儒生，根本否定孙武其人。与此相反，历史上著名的法家人物，都热情歌颂孙武和他的兵法。战国时代，法家大凡论兵，没有不“祖述”孙子的。韩非说：“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孙子兵法》在历史上流传甚广，汉代，一般人讨论军事问题，都以《孙子兵法》为依据，“皆道‘孙子’十三篇”。三国时著名的法家人物曹操对孙子的兵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根据他的实践经验加了不少精辟的注释，也是曹操一生中坚持法治路线取得成就的一个重要因素；诸葛亮更盛赞孙子“以法治军”的法家路线，说他所以能制胜于天，就是因为“用法明也”；宋代的进步学者黄震也称赞孙武的书不仅是兵家的鼻祖，而且在其他方面也有很高的价值，诸子百家中，除了荀子和杨子以外，其余的人根本不能与孙武相比的。明代的李贽推崇更高，赞叹孙武是“至圣至神”。毛主席教导我们：“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历史上的对孙武及其兵法的褒

贬，并不是什么学术上的问题，而是儒法两种思想、两条路线斗争在思想领域中的反映。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孙武和他的著作，虽受到了反动地主阶级和孔孟的徒子徒孙的贬抑和攻击，但孙武和他的著作并没有因此而减弱了它的光辉。《孙子兵法》既被列为《武经七书》之首，更被国外推崇为“东方兵学的鼻祖”，“兵学圣经”和“世界古代第一兵书”，在中外军事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总的说来，孙武作为法家军事家，他的军事思想与儒家是根本对立的，曾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许多论点，至今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由于他是两千五百年前的剥削阶级的军事家，他的军事思想就不可避免地受到阶级和历史的局限。他虽看到人心向背的重要性，但不可能认识到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伟大作用，更认识不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因此他低估、轻视士兵群众的力量，定出“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的“愚兵政策”。另一方面则把将帅看成国家和人民的主宰，片面地强调了将帅个人的作用，暴露了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和地主阶级军事家的本性；在战略战术上，他强调进攻，力求速决，却看不到战略持久的必要；在朴素的辩证观点中，则把事物的发展变化看成是无限循环的、简单的重复，而不是螺旋式上升。至若“围师必阙，穷寇勿追”的观点，则表现了革命不彻底性，也是应弃的糟粕。我们在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著作，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同时，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批判、继承这一份历史遗产，使之为我们批林批孔、防修反修做好反侵略战争准备服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 计 篇

## 〔提要〕

《计篇》是《孙子兵法》的首篇。主要讲战前如何分析敌我情况，制定作战计划的问题。

文中首先论述了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孙武说：战争是关系到国家存亡，人民生死的大事，要慎重考虑，认真对待。孙子能够把战争首先作为政治问题来考察，这在当时是难得的。

战争既然如此重要，那应如何去争取胜利呢？孙武提出“五事”、“七计”，对战争诸方面条件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并进一步指出：作战不能照搬死板的教条，必须善于发挥主观能动性，灵活机动，虚虚实实，因势利导，掌握主动，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争取战争的胜利。揭示了战争胜负的可知性，和创造有利条件争取战争胜利的可能性，体现了孙武作为法家军事家的可贵思想。

孙武非常重视用人选将，认为对于战争的胜负是有重要影响的，因此要求既要有指挥的才智和威信，还要有爱护部下，英勇作战和执法严明的品德。这体现了孙武“任人唯贤”的法治思想。